

李浴日的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的編譯和研究

李龍

卡爾·馮·克勞塞維茲（1780—1831），普魯士（今德國）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軍事歷史學家，他運用德國古典哲學理論總結以往戰爭特別是拿破崙戰爭的基礎上寫成了《戰爭論》，揭示了戰爭的基本原理和指導戰爭應遵循的一般原則，因而被譽為“西方兵聖”。該書自 1832 年問世以來，一直受到東、西方各軍事學家和政黨領袖的高度重視，先後被譯成英、法、日、俄、漢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方軍事理論的發展。在中國，國、共兩黨對它的傳播和研究都非常重視，因而使它成為中國近、現代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和中國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主要來源之一。李浴日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的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在中國的早期翻譯、推介和研究的專家。早在東瀛留學期間，他編譯《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時就多次對該書加以引用和評述，在往後的 20 多年間，他在其出版的有關論著中曾從多個方面進行論述，形成了他的看法和觀點。時間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當我們回過頭來梳理他的這些看法和觀點時，發現它極富有遠見性。為了批判地吸收西方優秀軍事文化遺產，現對其編譯情況加以總結，並對其研究的觀點進行初步的歸納、探析，以求正於方家。

一、翻譯出版成田賴武編譯的《戰爭論綱要》，彙編出版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研究成果。

《戰爭論》傳入日本後，一直受到該國軍事界的推崇。對日本軍事人才的培養起了重大的作用。1940 年，日人成田賴武“有感於將戰爭的一般理論介紹於世人的必要”，把它編譯成日文。編譯時，“係將克氏《戰爭論》作簡明的介紹，毫無憑著者的臆斷來修正補充，惟鑑於近代戰爭的實情，自然省略其應廢棄的部分，或在重要部分，用‘附說’加以說明。”⁽¹⁾書名定為《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出版後以日文形式傳入中國。1943 年春，李浴日赴重慶進行文化勞軍時在

“政治文化工作委員會圖書室”借得此書。在翻譯條件極大困難的情況下把它譯成中文：“先在桂林譯就‘總論’，繼在韶關一個山崗上費了兩個月的工夫，譯成全書。”⁽²⁾該書初名《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當時正值抗戰軍興，頗受歡迎。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李浴日重返南京將此書再版，楊言昌中將為該書作序，1947年，出版第3版時，改名《大戰原理》。1950年李浴日到台灣，於次年9月在台灣首版，“為求顯明計，仍用原名。”書名由胡璉上將題簽，徐培根上將在再版時題詞。至1956年6月，該書在台灣出版了第4版。此後的20世紀50年代後期、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本世紀初在台灣多次重版，至今一共出版了10多版，成為民國以來海峽兩岸頗有影響的軍事譯著。

《戰爭論綱要》是解讀克氏《戰爭論》的重要著作。夏徵難在《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研究》附錄中把此譯著列入研究克氏的早期重要專著。全書20萬字（內有圖表60餘篇），包括序言、總論、主要內容、結論及附錄；主要內容分八章，分別為戰爭的本質、戰爭的理論、戰略、戰鬥、戰鬥力、守勢、攻勢、戰爭計劃；附錄共收入三篇文章：萬耀煌的《讀克勞塞維茲戰爭論雜記》，松村秀逸作、李純青譯《克氏戰爭論是腓特烈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結論》，李浴日的《依克氏戰理論台灣攻防戰》。由於“日本成田賴武取克氏之書，汰其陳舊，刪其繁冗，期合於時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擯棄克氏之方法論於不顧，而徒以克氏之若干命題，視為黷武主義經典，是則重違吾人研究克氏之本意矣。”⁽³⁾因此，李浴日翻譯出版此書，對人們加深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來源的認識、借鑒西方軍事理論，開展抗日反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普遍歡迎。正如楊言昌將軍評價道：“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孫子，蜚聲論壇，茲復譯成田氏（成田賴武，筆者註）之書，知余克氏學說之介紹不無些微因緣，乞為之序，爰書所見如此。”⁽⁴⁾徐培根將軍也評價說：“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為西方兵學名著……惟卷帙浩繁，文辭艱深，余友李浴日先生，先曾與以摘譯，編為綱要，提精取華而綜核原義。”⁽⁵⁾以此可知，李浴日對推動《戰爭論》在中國的普及和研究功不可沒。

李浴日在編譯《戰爭論綱要》的同時，還彙編出版孫、克學人研究成果《東、西方兵學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2月）和《孫克兵學新論》（1946年2月）。這是近代第一次結集出版的研究克勞塞維茲軍事思想的論文集，也是第一次出版的孫子和克勞塞維茲軍事思想比較的論文集。在所收集的作品中，“除發表作品外，尚有特約稿數篇，這是值得一提的。”也就是說李浴日除了把公開發表的論文彙

編之外，部分論文是親經他稿約的。彙編論文克氏部分主要包括：吳石《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研究》、林薰南《如何研究〈大戰學理〉和我們怎樣學克氏》、萬耀煌《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雜記》、松村秀逸著，李純青譯戰爭《克氏〈戰爭論〉是腓特烈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結論》、蕭天石《克氏軍事天才論闡微》、彭鐵雲《孫、克兩氏兵學思想的比較及其批評》、陳南平《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影響》等。這些論文集，作者大多為軍界中將以上或文化名人。如吳石(1894~1950)，福建閩侯縣人，中將，曾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軍政部任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等職。林薰南(1890~1982)，湖北黃岡人，抗戰將領，著名粵北會戰及曲江保衛戰的籌劃指揮者，民國政府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中央兵學研究院中將院長等職。萬耀煌(1891-1977)，陸軍二級上將。曾任師長、軍長、軍團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等職。李純青(1908-1990)，福建安溪人，文化名人，後任台盟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蕭天石(1908-1986)，湖南邵陽人，著名學者。這部分論著有有的是對克氏理論進行論述，有的則對孫、克理論進行比較和研究，它們代表國民政府克氏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克氏研究的時代動態。李浴日把它歸為“克氏之部”，與“孫氏之部”進行比較，以增進人們對這兩部軍事巨著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此外，在《世界兵學》月刊裡，他也較注意收集、刊登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在《世界兵學》第6卷第1期，刊登加藤哲三著、譚善如譯的《克勞塞維慈和魯登道夫的見解》，在《戰鬥》月刊中刊登劉聞祖的《論克、約兩氏的戰爭藝術》等，對擴大克氏軍事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陳南平在《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影響》的前言中稱：“李浴日先生對於兵學甚有造詣，而對孫子及克勞塞維慈兩氏之兵學研究尤深，比者曾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及《中山戰爭論》，均有精深之列，為世所欽崇，今者特編是冊，其裨益於吾國兵學界，絕非淺鮮，因李浴日先生之編是冊，其著眼甚高而富意甚深也。”⁽⁶⁾邵青在《民國政府與民國孫子學的發展》裡評價道：“李浴日編輯的《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該書為近代第一部研究孫子和克勞塞維慈軍事思想的論文集，共收錄了論文十一篇，其中孫子兵法研究類六篇，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五篇，對孫子兵法與戰爭論進行比較研究。作者多為當時國民黨中、高級將領，如萬耀煌的、林薰南、吳石等。”⁽⁷⁾可見李浴日這兩本書在孫、克兩氏比較研究方面的貢獻和影響了。

二、對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理論做綜合闡述

克勞塞維慈在《戰爭論》中，用哲學思維方法分析戰爭現象，形成了他的戰爭哲學思想。李浴日在《戰爭論綱要》第三版序言中引用恩格斯的話說：“思想家恩格斯評價說：‘我最近讀過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深覺其具有獨特的哲學方法，就內容而說，也是一本很好的書。’”⁽⁸⁾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體系非常龐大，理解非易。李浴日著重從他的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戰爭的本質、辯證法問題、絕對戰爭和現實戰爭、進攻和防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歸納，並進行了相關學理的應用。

(一) 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

李浴日認為，克勞塞維慈戰爭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黑格爾。在 1951 年 9 月台灣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序言》中，他對這個問題做了概括。他說：“他（指黑格爾，筆者註）是戰爭政治學的建立者。”“欲研究克勞塞維慈（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戰爭論，不可不懂得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哲學，因為克氏受黑氏哲學的影響太大了。黑氏與克氏生於同一時代，其影響於克氏，正如老子影響於孫子一樣。”⁽⁹⁾李浴日分別從克氏戰爭哲學中的“絕對觀念”來源於黑格爾及其批判地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建立起他的戰爭理論體系兩方面進行了評述，探討其戰爭理論的淵源。

關於克氏戰爭哲學中的“絕對觀念”來源於黑格爾這個問題，李浴日主要從克氏關於精神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去闡述的：“黑氏是一個觀念論者，如《歷史哲學》一書，強調宇宙的本體是‘絕對精神’，‘理性統治著世界’，‘根據思想並按照思想去構造現實’，這確給予克氏很大的影響。在克氏以前的兵學都是崇拜幾何兵學的戰略態勢，或囿於物質威力的比較，而克氏卻能認識精神在戰爭上的重要性，並列精神要素為五大要素之首位。”⁽¹⁰⁾克勞塞維慈所稱的精神因素（或精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質等），主要是指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國民精神等。在“軍事天才”一章中，他曾經專門探討了統帥的才能問題。克氏認為，精神因素十分重要：“精神力為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而為其操縱。”“精神的諸力足以影響軍事行動的全體，而且軍隊的運用，也是憑於指揮官的意志力而決定，即軍隊與將帥、政府等的智能及其它精神上的各種特性，戰地的人心，戰勝戰敗的影響等都足給予軍事行動的重大影響。”⁽¹¹⁾李浴日引述克氏關於精神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去闡述克氏戰爭哲學中的“絕對

觀念”來源於黑格爾的觀點，表明克氏已經充分認識到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辯證看待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說明克氏的戰爭哲學比前人前進了一大步，同時也說明李浴日充分肯定克勞塞維茲對黑格爾“絕對觀念”的合理吸收。

“黑氏在哲學上貢獻最大的還是他所建立的辯證法 (Dialectic)，克氏《戰爭論》的特點就是接受了黑氏這個哲學方法論，他的《戰爭論》是一貫地用辯證法寫成。日本研究克氏戰爭論者亦說：‘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是以黑格爾的理論為根據而更發揚光大了……他的理論雖不完整，但一貫地用輝煌的辯證法寫成，這證明他所用方法的偉大。’”(12)這是李浴日對於克氏批判地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建立起他的戰爭理論體系的另一個觀點。對於這個觀點，他主要從克氏戰爭哲學的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的構成進行了解析：

首先，克氏運用了黑格爾辯證法則中的“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來說明“觀念”：“‘正反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則，克氏則用以分析戰爭現象，闡明戰爭原理，建立他的戰爭理論體系……’‘戰爭是交戰雙方各為屈服敵方意志之無界限的努力。’於此又分為：(1)暴力使用的無界限性……(2)打倒感情的無界限性……(3)‘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都是從‘正’(我)‘反’(敵)雙方來觀察，再發展為‘合’——‘打倒敵人’或‘壓倒敵抵抗力為止’(亦即否定的否定)來說明觀念。”(13)

其次，克氏用黑格爾辯證法(對立統一法則)來研究戰爭的防禦與攻擊：“原來所謂防禦與攻擊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但克氏卻作統一的觀察。”如說：防禦中伴著攻擊的動作，攻擊亦伴有防禦；“戰略攻勢中的防禦是攻者所犯的弱點，即矛盾說：‘A、戰略攻勢的防禦足以拘束攻者的突進，此際的防禦不獨不足以強化攻擊，反會牽制攻者的行動，及消耗其時間，徒足增加防者的準備之利。B、戰略攻勢的防禦比一般防禦為易敗的作戰形式。何故？因為攻者不能享受戰鬥的準備，地形的熟識與利用等防禦上的利益，全陷於被動的地位。’(均見第七篇第一章)”，說明防禦與攻擊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又如“……軍事行動的休止與緊張，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等也是作對立統一的觀察。至於在整個戰役上由守勢到攻勢，或由攻勢到守勢的轉換及其過程，這是從量到質的變化。”(14)

再次，克氏用黑格爾辯證法中關於“變”(變化與發展)的概念對待不同時期的戰爭理論：“克氏在《戰爭論》上獨能打破形式邏輯，方式主義，武斷主義

與機械論，這也是基於辯證法的觀點。”李浴日指出：“‘在各時代便有各時代獨特的戰爭理論。’亦即說，戰爭理論是要跟著時代而變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變’（變化與發展）是辯證法的最基本概念，而克氏在《戰爭論》上正充分錶現了這個概念。”（15）

李浴日關於克氏戰爭哲學的辯證法來源於黑格爾的論述，揭示了克氏戰爭理論與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在聯繫，對人們認識克氏戰爭哲學的實質、把握克氏研究戰爭的規律和辦法起了積極的作用。

多年以來，關於克氏戰爭哲學思想的來源國外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英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 J·F·C 富勒和巴茲爾·亨利·利德爾·哈特就認為它來源於康德，是唯心主義二元論。而李浴日（包括同時期的軍事學者楊言昌等）卻自覺地接受了來源於黑格爾的觀點。其實，這本是馬克思經典學家的觀點。列寧在 1915 年 5 月完成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書中認同克勞塞維茲關於“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原理時就說過：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受胎於黑格爾”。近 20 年來，中國大陸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研究專家對克氏戰爭哲學理論的來源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夏徵難在《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研究》一書中，認為克氏戰爭哲學理論的來源有二方面：一是受康德影響，二是受胎於黑格爾，而“黑格爾的哲學有決定性影響。”（詳見夏徵難《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研究》第二章）可知，黑格爾對於克勞塞維茲的影響是最直接的，說明二人的思想聯繫極其密切。李浴日等人認為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黑格爾的觀點為後來中國軍事哲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關於戰爭的定義

在李浴日的著述中，概括克勞塞維茲戰爭的定義有三處：一處是《兵學隨筆·第一輯·戰爭的定義》：“西洋兵書所下的定義，向以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定義：‘戰爭是為屈服敵人，實現自己意志而行使的暴力行為’為正確洽當。”一處是《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戰爭思想》：“克勞塞維茲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戰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鬥爭，即決鬥，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跟著說：‘戰爭是為屈服敵人，以實現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克氏又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為一種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對外關係的繼續，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為——浴日註）施行之。’”一處是《孫子新研究·始計第一·戰爭定義的種種》：“不過大家一致推許的，乃為克勞塞維茲將軍的定義，彼在其

名著《戰爭論》上說：戰爭不外以別的手投（強力手段）而進行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決鬥的進化。……因之所謂戰爭是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

對於這三處概括的定義，李浴日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說明。第一處指出：該定義“但稍嫌限於武力戰。降及今日，以戰爭已進化為全體性的戰爭，全球性的戰爭，又為反侵略的戰爭。”⁽¹⁶⁾這是李浴日從現代立體戰爭的範圍綜合概括的，說明李浴日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克氏的戰爭定義。第二處他是從戰爭的本質概括其定義。第三處他對“戰爭是屈服敵人而實現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克勞塞維茲以後，因為‘社會的狀態’，發生了顯著變化，所以把近代戰爭，單認為政治的繼續，尤其不問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錯誤的；因此，便不能僅以軍隊為主的武力行為當作戰爭的手段了。”⁽¹⁷⁾所以，戰爭的定義必須要以和平為歸宿。他給戰爭下的定義是：“‘戰爭是全球各民主國家發揮全力以粉碎侵略、屈服敵人、而維持民族國家之生存及保障世界之和平的行為。’此行為包括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心理戰的一切戰爭行為。”⁽¹⁸⁾李浴日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克氏戰爭的定義做了擴充，並把戰爭的正義性作為評價的標準：“顯然是從戰爭的正義性角度來進行的，排除了戰爭的非正義性。”“由此可見李浴日所主張的戰爭是抵抗侵略、維護國家和民族獨立、保護世界和平的戰爭，而非侵略戰爭。不僅如此，而且把戰爭擴展為包括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心理戰的一切戰爭，改變了以往人們所認知的戰爭乃局限於軍事對抗的戰爭。”⁽¹⁹⁾

（三）戰爭的本質

“在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中，最具有學術價值的、最受人重視的就是他在馬克思誕生前的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繼續’的著名論斷。”⁽²⁰⁾從而揭示了戰爭的政治本質。克勞塞維茲是在考察絕對戰爭和相對戰爭之所以存在差別時提出這一問題的。李浴日認同這個觀點，並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述析：

第一，“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為——浴日註）實現意志的行為。”

李浴日首先從戰爭是政治的手段，並且是政治的特殊手段進行分析，說明政治與戰爭之間的差別性。他說：“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用以貫徹政治目的之手段。”⁽²¹⁾“黑氏說：‘在歷史的現像中，是以戰爭防止國內

的不安，加強國內的團結的形態而出現。’這是把戰爭當作政治的一種手段的。”

(22)他以普法戰爭為例說明戰爭為政治的手段：“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固勝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聯奧及對俄調協，使法國陷於孤立，以協助軍事。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英，雖勝於蘇費立倭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外交手段，聯法聯英，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力對付奧國，這是兩大顯著的例證。”(23)

同時他又認為，戰爭並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殊的政治。他在《中山戰爭論·戰爭與政治》中，從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說明戰爭不同於一般的政治：“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關係戰爭的勝敗至鉅。倘若內政與外交俱不配合戰爭，甚至背道而馳，非導致戰爭失敗不可。”(24)就內政來說，“足以影響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從外交而論，“外交與軍事本為‘難兄難弟’，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爭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他引用孫中山的論述說明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他（國父）說：凡國家之國策已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25)

李浴日把內政和外交作為政治的形態進行闡述，說明它們與戰爭的區別和密切關係，這一論述充實了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的內容。因為克氏並沒有把內政作為政治的形態進行詳述。李浴日的論述，深化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觀點，這是李浴日對民國時期克氏戰爭理論研究的一大突破。

第二、戰爭和政治目標是一致的。

李浴日接著分析這種一致性的表現。其一，將帥也是政治家：“克氏說：’凡為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和政治是一致的，將帥也是政治家。’”(26)他引用孫中山《民權主義》的論述，說明它們之間的一致性：“如果說軍人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用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麼是政治。”(27)說明政治不能違背戰爭的性質。其二，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戰爭：“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德國的戰爭思想是德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英國戰爭思想是英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蘇聯的戰爭思想是蘇聯政治思想的反映，現在我國（指民國，筆者註）的政治思想是三民

主義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即為實行三民主義，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為國家而戰的戰爭思想。(28)其三，戰爭反作用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戰爭所要求於內政，最要緊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才可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所以在內政上就應設法促成全國的團結一致，能如是，則不會發生無謂的磨擦，以相抵銷，更不會被敵人挑撥離間，以分裂力量了。”(29)雖然李浴日認同戰爭是政治延續的一種手段，“但克氏是為戰爭而戰爭，卻不問政治目的的好壞。”他強調，只有“為革命而戰爭”，為正義而戰爭，才是戰爭的目的。李浴日關於戰爭本質的透切論述，說明李浴日與克氏一樣對戰爭的思考並不囿於單純的軍事範圍，而是把政治與軍事視為一體，反映了他從戰爭的內在聯繫去探求戰爭本質的，充滿了辯證法思想。不過，他所稱的“政治”和“正義”，屬於孫中山三民主義範疇，與馬克思經典學家關於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有鮮明的階級性有區別。

(四) 關於克勞塞維慈戰爭理論的側重點。

李浴日在《孫克兵學新論》裡，對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所論述的戰爭側重點進行了歸納，認為克氏的論述重點放在陸戰方面，它主要是關於陸戰之書（但所涉及的戰理可應用於海戰和空戰），而並非是論述全體性戰爭的書：“惟據我今日對克氏這部遺著的研究，認為它確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戰或軍事戰的名著，不是把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及武力戰冶於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30)“克氏在其著作中，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他是側重於外交方面，並沒有論及內政應採取如何方式。雖有多少關於經濟戰、宣傳戰和間諜戰的言論，但分量上未免太不夠了。再就他在武力戰上而說，因為克氏的眼界太局限於大陸，所以他沒有提到海軍問題，陸軍與海軍聯合作戰問題，又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談到空軍，亦為必然之事。”(31)李浴日站在現代立體戰爭的立場對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忽略之處做了擴展和延伸。認為“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性戰爭，即動員全國的力量用於戰爭的競賽上，其形態分為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軍事戰，但仍以軍事戰為骨幹……在這個新戰爭的洪流中，倘若有人還想僅憑軍隊的作戰以製勝，其愚真不可及。倘若人家以全體性戰爭加諸我，卻不能發揮全體的力量來應戰，實無從克敵。要之，每一個國民均須參加戰爭，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均與戰鬥條件一致。”(32)他在《中山戰爭論》和《孫子新研究》、《兵學隨筆》中對政治戰、

經濟戰、宣傳戰和間諜戰等都進行了充分的論述，說明李浴日用發展的眼光對待克氏戰爭理論問題，擅長用戰爭學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這是李浴日軍事思想的可貴之處，這是他對克氏軍事理論在新的形勢下的發展所作的貢獻。

（五）關於防禦與進攻的關係

防禦與進攻是最基本的作戰形式，也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中闡述的重要軍事學理之一。李浴日認同和重視二者的關係，從學理解析和學理應用方面進行了闡述和發揮。

1、防禦與進攻的關係

李浴日在台灣版《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序言、《從克氏〈大戰原理〉論台灣攻防戰》等文章中，對克氏的守勢和攻勢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引述，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四個內容：第一，防禦和進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即防禦亦伴有攻擊。如說‘守勢本身的目的，在維持現狀，於每一部分上，欲殲滅敵軍，則常要伴著攻擊的各種動作。’（第六篇第一章）攻擊亦伴有防禦：‘戰略攻勢常伴有防禦，正如戰略守勢不是絕對的待敵和防止，常為擊滅敵人而伴著攻擊的動作，即戰略攻勢是攻守兩種行動不斷的交替與結合。’”⁽³³⁾說明防禦與進攻是相互包含的，互相滲透的，它們都不是單一的整體。而這裡所說的防禦不是絕對的等待和抵禦，而是積極的防禦。第二，防禦是比進攻更為有利的作戰形式。李浴日認為，就攻防作戰形式而言，防禦比進攻更為有利是由於克氏指出防禦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優點：首先，守勢的價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從戰術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攻者實行全體的奇襲為有利，防者則以實行部分的奇襲為有利，攻者須企圖包圍攻擊其全體為有利，防者則以完成部分的包圍企圖為有利，至於地利專屬於防者。”從戰略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攻者戰略上的奇襲比較戰術上的奇襲，其效用更大，但非乘防者的過失不可，且此種現象不常有。防者乘攻者兵力分離之際，而奇襲之，利益屬於防者。攻者火力包圍的不可能及交通線當侵入敵國時，易發生弱點，防者在戰術的場合較可減少退路的威脅，及活用內線的效果。攻者侵入敵地愈廣，則戰場之補助作用效果愈減少，防者則有要塞的協助，糧食及補給等的便利。防者有國民軍的協助，民眾武裝的蜂起等利益，而攻者則無，又地形之利專屬於防者，而攻者則無。至於攻者雖具有精神的優越，但防者憑將帥的才能，而巧為利用之，則尤優。”⁽³⁴⁾其次，守勢會戰中的要塞或防禦陣地的價值遠比攻勢大：“即攻者不能使用國境附近的要塞，

反之防者卻可適切在利用深設於內的要塞。”再次，在國內防禦上，防守者可以得到民眾的協力支持，“反之，攻者欲向民眾課徵時，要出以武力的強制，則很困難和麻煩，民眾的協力愈密切時，便變為武裝蜂起，即武裝自動參戰。”最後，防者可得到“同盟者”的同情與支持：“國際間利害的錯綜，足以促進政治的均衡，並有維持現狀的傾向，故防者為維持現狀採取自衛行動，便易取得同盟諸國的同情與協力，成為有利的援助。”李浴日通過以上引述，並比較攻防兩種作戰形式的優缺點，進一步確立了守勢在攻防上的地位，從而說明克氏關於“守勢比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的結論為正確的。第三，防禦與進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如果說成功的防禦不知不覺地轉為進攻，那麼進攻也不知不覺地轉為防禦。”“‘以近待遠’，照普通的解釋，為我軍先到戰場，佔領戰地，迎擊從遠方進擊而來的敵人，即解為採取防禦態勢者亦多；然而如克勞塞維慈在戰爭論上所說：‘防禦之後，斷然轉為攻勢。’那還不失為真理。”（《孫子新研究·軍爭第七》）表明攻防關係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相互交替和變化。

防禦與進攻的辯證關係是克氏在綜合總結當時歐洲各國抗擊法國入侵的戰爭經驗的基礎上而得出了的正確結論。李浴日對這個結論進行解析和歸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攻防關係的內在規律”，揭示了戰爭攻防關係的本質。

2、防禦與進攻關係的學理應用

（1）關於抗日戰爭。“克氏的學理曾支配了十九世紀，毛奇一戰而勝丹麥，再戰而勝奧國，三戰而勝法國，就是通用克氏學理的結果。洎乎今日，雖因戰爭時代的不同，但克氏的基本原理依然不變，各國軍人猶奉為經典。”如前所述，依據“攻勢”和“守勢”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這個戰理，李浴日以此預測和分析抗日戰爭：日本處於攻勢，具有攻勢的優勢和弱點，中國處於守勢，具有攻勢所沒有的優點。日本的速決戰既然不能實現，那麼它所面臨的將是持久戰。在持久戰的進程中，將會出現戰略防禦、戰略反攻的情況：“這次中日戰爭正在進行著克氏所說的‘現實戰爭’，或持久戰，我們正採取著克氏所認為最有利的守勢戰略，實行國內退軍，取得時間餘裕，增強戰力，待機反攻。”⁽³⁵⁾這個戰理在其後出版的《戰爭論》的序言中給予概括和補充。以此而論，抗日戰爭必將取得勝利（詳見拙作《李浴日抗日戰爭理論述論·速決戰理的依據》）。事實證明，李浴日運用這一學理對整個抗戰的判斷和分析是正確的。

（2）關於台灣攻防戰。1950年6月，李浴日到台灣後出版了《台灣必守鐵

證》一書。在該書第四章，他再次運用防禦和進攻關係戰理分析台灣攻防戰（後他又以《從克氏〈大戰原理〉論台灣攻防戰》為題收入台版《戰爭論綱要》附錄裡）。

李浴日在該論文中，詳細引述克氏關於“守勢比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的戰理證明台灣在攻防戰中會取得勝利。克氏認為，守勢比攻勢之所以更有利，是因為守勢具有攻勢所沒有具備的優點，這是比較攻防之間的利弊得出的結論。他指出，守勢的價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防者俱有地形（要塞、陣地）、民眾武裝和同盟者支持等條件（詳見防禦與進攻的關係）。依此戰理，台灣攻防會戰，“共軍”為攻者，“國軍”據台灣為防者，台灣擁有海、陸、空的軍事優勢，擁有同盟者（如美國）的支持，“擁有過去日人所慘淡經營而又經過加強的基隆、高雄、馬公諸區要塞”，“……佔有優勢的有利地形。如前線據點金門、馬祖，及台灣海峽，即等於克氏所說的足以製敵死命的‘國土鑰匙’，如果共軍對這些鑰匙沒有辦法打開，休言攻台。而我們守台亦以拒止共軍於台灣海峽之外為上策。”⁽³⁶⁾

李浴日從當時國際背景出發，試圖對台海兩地作戰的環境、條件做戰理上的應用。其所謂的反攻，就是堅守台灣，以台灣為跳板（並不是希望獨立台灣或讓外族佔領台灣自己充當傀儡），期待來日組織有效的渡海作戰，反攻大陸，恢復對中國大陸的統治。而防守的註腳即是維持台海和平現狀，建設美好台灣。當時在蔣介石剛剛退守台灣的情況下，它為鞏固蔣介石在台灣政權，鼓舞敗退台灣的國民黨士氣、安定台灣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台灣蔣介石政權制定維持台海和平現狀政策、建設美好台灣也有借鑒之處。不過，克氏攻防戰理卻不適用台灣問題的解決，這是李浴日學理應用的不足。台灣問題的解決用不上攻防，倒是更符合應用孫子兵法關於“全國為上”的戰略，即走和平統一道路。

今天，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岸關係已從敵對走向“三通”，兩岸經濟與民間往來更加密切。戰則兩敗俱傷，和則雙贏。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主要靠兩岸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們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負責、面向未來的求實態度，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歷史的選擇，靠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台灣回歸祖國勢所必然，中國的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而且越快越好！

（六）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

1、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及其關係

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是克氏提出的關於戰爭的一對基本概念，也是

分析戰爭形態的重要軍事學理。它集中反映了克氏考察戰爭問題時的獨特思維方式和研究特點。李浴日在探討韓戰問題時，對這對概念的性質及其關係做了引述、分析和歸納。

首先，這兩種戰爭具有不同的性質、特點：“克氏在《戰爭論》上把歷史上的戰爭性質分為兩種——一是‘概念的戰爭’，一是‘現實的戰爭’（即永久法則）。”概念性戰爭，即絕對戰爭、抽象戰爭，是指原始概念固有的按其自然趨向所表現出來的形態。它只存在於抽象的邏輯理論之中，是一切戰爭的原始形態。它具有如下的特點：“……克氏所說概念戰爭的性質是戰爭行為的無界限性：（一）暴力使用的無界限性；（二）打倒感情的無界限性；（三）力之發揮的無界限性。換言之，純為武力主義，亦即殲滅戰爭。”⁽³⁷⁾也就是說概念性戰爭具有極端性、抽象性等特點，與現實性戰爭是排斥的。

現實性戰爭，又叫具體戰爭，實際的戰爭。是指戰爭原有的趨向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影響發生變化，以區別於本來面貌的形態。它具有如下的特點：“克氏就‘現實戰爭’的性質分析說：‘政治目的對軍事行動的支配力愈大，則軍事行動愈遲緩。’（第一篇第一章）又說‘戰爭的動機與緊張性微弱時，則暴力必遵從政治指定的方向而行動，戰爭愈與政治相近似。’（同章）又說：‘在現實戰爭上，一方不能完全剝奪他方的抵抗力時，則彼我雙方俱從事於勝敗，及其所必要消耗之力的推測，因而造成媾和締約的動機。’（同章）又說：‘戰爭的動機微弱時，則戰爭的本質，如互相作用、競爭、猛烈性、無拘束性等完全消失，彼我兩軍，俱不冒險，僅運動於極狹隘圈內，極其量亦不過以恐嚇手段，對付敵人，使有利於外交談判，以結束戰爭而已。’（第八篇第三章）”“‘一國與他國締結攻守同盟以援助時，但所得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他國決不會放棄本身的利益，而認真援助之。’又說：‘當兩個國家協同對敵作戰時，其中必有一方無意於積極協助，以征服敵人，先考慮本國的危險與可得的利益，然後出兵相助，正類似商業交易，不使資本遭受意外的損失，在這種場合，軍事的目的全受政治影響以至支配。’（第八篇第三章）”以上是從戰爭的政治目的、動機、媾和締約、同盟者利益等外在因素對戰爭的影響進行概括現實性戰爭特點的，說明戰爭總是受戰爭以外力量的影響。也說明現實性戰爭具有具體性、不完善性等特點。

其次，這兩種戰爭是密切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也就是說概念性戰爭反映戰爭固有的基本形態，它約束、度量現實性戰爭，反過來現實性戰爭

是體現戰爭發展變化多樣性的具體形態，它可以“補充”、“修正”概念性戰爭。

李浴日關於克氏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及其關係的引述和分析，對分析各場戰爭的形態，通過各種戰爭現象的實質，有著重要的啟發。

2、學理應用。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了一場大規模戰爭。後被稱為韓戰（即朝鮮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中、蘇等18個國家也不同程度地捲入。它是冷戰背景下進行的一場實際戰爭。李浴日稱之為“局部性的世界戰爭”。在戰爭爆發一年多的1951年9月，李浴日在《實踐》雜誌上發表了《從克氏〈戰爭論〉論韓戰》的著名論文。在這篇論文裡，他運用上面克氏關於概念性戰爭和現實性戰爭（即永久法則）的軍事學理對這場戰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進行了歸納，對這場戰爭的形態進行了判斷，對其未來的發展進行預測。

李浴日認為，這場戰爭是現實戰爭，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點：

第一，韓戰各方未能發揮無界限性戰爭行為，決定這場戰爭是‘現實戰爭’或有限度戰爭。他首先從克氏關於“概念性戰爭”的形態入手，比對參加韓戰的美、南韓、北韓、中、蘇、英各國作戰目標、計劃，得出這次韓戰不具有概念性戰爭的特點，而是現實性戰爭：“……美國政府限制自己空軍不得轟炸共軍的‘庇護所’東北及中國大陸，海軍又不得封鎖中國大陸沿海，且迄未使用具有最大毀滅性的原子彈。顯然的，美國政府是不欲使戰爭行為作無界限性的發揮，成為‘概念戰爭’。雖說最初北韓進攻南韓，似乎想採取此種戰爭方式擊潰南韓，甚至要把聯軍驅逐下海，卻未成功。中間麥帥指揮大軍由仁川登陸，直趨北韓，亦近此種方式。因共軍的突然參戰，亦未成功。實在說，韓戰的性質乃屬於克氏所說的‘現實戰爭’，亦即美國當局所宣稱的‘有限度戰爭’（同書第一篇第一章）。“……斯大林亦迄未敢以其自己的陸、海、空軍作無限度的參加韓戰，於是戰爭愈受現實的政治所支配，不能發揮無界限性的行為，充分發揮武力的價值，便成為‘現實戰爭’，亦即消耗戰爭。”（38）

第二、韓戰各國有邊打邊談邊拖、戰火不再擴大的動機，具有把戰爭還原於‘現實戰爭’的性質。接著他又從克氏關於“現實性戰爭”的學理分析此次韓戰各國出現的種種戰爭現象：美國軍事行動遲緩，“始終不做武力無限性發揮”；出現馬立克之和平建議；開始媾和締約的開城談判但無結果；韓戰迄未擴大到韓國以外的地區；雙方用恐嚇手段以促成外交談判等等。說明此次韓戰是“有限度戰爭，

亦即把戰爭還原於‘現實戰爭’的性質……這就是‘現實戰爭’的必然表現。”(39)

第三，“同盟者”英國在此次韓戰中出於考慮本國的危險與可得的利益，不會放棄本身的利益，而認真援助韓國，其所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說明此次戰爭是現實戰爭。(40)

通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李浴日認為這場戰爭形態是現實性戰爭，美、中、蘇、韓、朝等交戰各方處於膠著狀態，各方都未能佔有戰爭的絕對優勢，決定了它是消耗戰爭。當然，他依據戰爭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學理認為，這場戰爭比歷史上的‘現實戰爭’都複雜，故雙方不易媾和。弄不好戰爭性質會發生變化，甚至發展為“概念戰爭”，即“無限度戰爭”。

韓戰是“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二戰以後以東、西方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對立為背景的一次大規模局部戰爭。它加劇了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遏制了美國向朝鮮半島北進的意圖。加強了蘇聯對朝鮮的控制。李浴日站在戰學角度論述韓、朝、中、美、蘇各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的關係。認為這次戰爭的形態是現實戰爭，即消耗戰爭，具有遠見性。他是韓戰中唯一一個用克氏軍事戰理分析這次戰爭形態的軍事學者。

(七) 用《戰爭論》與《孫子兵法》進行比較。

李浴日在《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東西方兵學代表作之比較研究》、《〈克萊塞維茲戰爭論綱要〉序言》中，把《戰爭論》與《孫子兵法》進行相互比較，總結出它們之間的異同點。(1) 二者的共同點：一是著作的目的相同；二是戰爭的原理、原則相同；三是二者崇尚“伐國”思想相同。(2) 二者不同點：一是著作形式不同；二是哲學思想來源不同；三是在戰爭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上著眼點不同；四是寫作的側重點不同等（詳見拙作《試論李浴日的孫子兵法研究》）。

除此之外，李浴日對克氏關於戰爭的根源、戰爭的目的、戰略戰術、戰史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評述和分析。

(八) 關於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的不足

雖然，李浴日認為：“克氏《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戰爭哲學，不特軍人應該精讀，即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秘本。”(41)但同時他也指出，由於時代的局限，克氏戰爭理論存在著許多不足。如對戰爭目的的闡述，就明顯帶有黷武主義思想：“克氏《戰爭論》最壞的影響，“就是他過度頌揚‘絕對戰爭’的思想，力斷‘戰爭為

暴力無界限的行使’，及反對戰爭哲學中混入‘博愛主義’，因此養成德國軍人極端殘暴的性格，表現於上次歐戰如此，即這次歐戰也是這樣。歐洲文明殆為納粹所摧毀了。”所以他主張：“我們研究克氏的理論，應排除其渣滓，攝取其精華才可。”又如克氏論述全破主義時主張實行殲滅主義：“從正面而論全破主義的，有克勞塞維茲將軍，彼關於‘殲滅主義’說：‘有惻隱之情者，也許這樣相信吧？對於敵人不加以多大損害，而解除其武裝，或不講求擊破的方法，而認為是戰爭術策的正當傾向；這種說法，在外觀上雖是美麗，實際則成為謬見，我們非把這種謬見打破不可。’”⁽⁴²⁾李浴日認為“這無異駁斥孫子言論的錯誤。”再如克氏關於暴力之無限界的行使時指出：“彼又關於暴力之無限界的行使說：‘戰爭是暴力行為，其行使沒有什麼界限；所以某方行使暴力，他方就不得不酬答以抵抗的暴力；這樣所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沒有極限的。’”李浴日引用日人大場彌平的《孫子兵法》的話做了闡釋：“要之，敵國的人民，不問老幼男女（僅有直接與間接之別），都一樣成為敵軍戰力的因素；故戰爭的本質，可以說是在消滅敵人之肉體的抵抗與心力的抵抗。雖然，倘若不經流血與破國，而能屈服敵人的方法也有，則彼（克勞塞維茲）也不會反對的。因為，孫子是從大的政略上論理想的兵法，克勞塞維茲係依交戰手段，以屈服敵人的實際行為作軸心。”⁽⁴³⁾這些均說明李浴日已經注意到克氏戰爭理論存在的偏頗，這對探討德國軍國主義的淵源以及在全世界（如日本）的流布和影響，都有重要的啟發：“日本自維新以來，拼命模仿德國，尤以兵學上受德國的影響為大，因之所受德國兵學上侵略思想，黷武主義的影響亦大，於此可見盲目的抄襲是要不得的。所以我們研究克氏的著作，就不要為他侵略的思想所影響。”這是李浴日研究克氏軍事理論的可貴之處。

除此之外，李浴日對克氏關於戰爭的根源、戰爭的目的、戰史研究、戰略戰術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引述和評析。

三、結語

清末民國時期，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經歷了從無到有、規模從小到擴大的過程。《戰爭論》傳入中國首先是日文。1908年中國《戰略學》教科書就糅合了《戰爭論》的基本思想，1910年冬之前，清政府軍諮府翻譯了《戰爭論》前六篇，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潘毅等延請同學何潤珊、瞿壽禔補譯，

1911年3月，中國第一部《戰爭論》完整譯本由陸軍教育研究社刊印，起名《大戰學理》（參看宋澤濱《〈戰爭論〉在中國：百年傳播及研究綜述》）。抗日戰爭前後，《戰爭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掀起了第一個高潮：“關於克氏《戰爭論》的譯本，亦有好幾種，如翟壽禔的《大戰學理》，訓練總監部的《戰爭論》，陸軍大學的《戰爭論》，黃煥文的《大戰學理》，柳若水的《戰爭論》，傅大慶的《戰爭論》（僅出有上冊，尚缺下冊）此外，尚有我（指李浴日，筆者註）正在逐譯中的《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成田賴武著），至於孫子和克氏的兵學研究論文，散見於各地報章和雜誌上，為數也不少。”⁽⁴⁴⁾從整體看，《戰爭論》早期譯本質量參差不齊、譯編並重，一些研究成果存在概述較多、深入不夠的缺陷，“但對推動學習研究《戰爭論》，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⁴⁵⁾

李浴日翻譯、編輯和研究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是國民政府軍事學界翻譯和研究《戰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歷史作用和貢獻表現在三大方面：

一是對《戰爭論》在中國的普及和研究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浴日學的是政治學專業，有紮實的哲學理論基礎。其治學嚴謹、認真。他靈活運用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包括自覺認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理論），廣泛聯繫西方軍事思想史及近、現代戰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對克氏戰爭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分析和評價，並進行相關學理應用。雖未整理成書出版，但基本梳理出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體系；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可視為對克氏戰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如他能延壽天年，一部完整的克氏戰爭理論研究必能問世！

二是服務於抗戰的。抗戰時期，由於敵軍的封鎖，戰爭理論讀物非常缺乏，各級軍事將領和廣大民眾十分需要它們做戰爭指導。為了適應這個需要，李浴日加緊翻譯、編譯和研究，積極為抗戰服務。正如林薰南在1943年5月出版的《〈東西方代表作之研究〉序》中評價說：“李浴日先生為富有研究精神之時代兵學家，現任世界兵學編譯社社長，當中日戰爭啟幕未久之際，而有《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譯著，茲值抗戰與侵略、民主與納粹兩大力量在東西兩方面做最後決鬥之今日，復有《東西方代表作之研究》之編纂，以闡發和貫通二氏最高鬥智之指導和秘訣，希望我國每一個時代戰鬥員人手各一編，而從中覓得和把握孫、克二氏之兵學神髓，其用心之深長，不難體會。以運用於各個作戰場合，吾深信其必所向有功也。”

三是為構建中國軍事學體系提供借鑒作用。《戰爭論》結構嚴密，代表西方

資產階級軍事學理論體系。李浴日站在孫中山國民革命的立場上，批判地吸收了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軍事思想，為民國時期中國軍事理論注入了有益的成分。他說：“所謂中國本位的兵學，其本質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內容則依於國情及對象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國固有的兵法，時代環境的需要，及世界各國的兵學。我們不能固步自封，離開時代，也不能盲目抄襲，全盤移植。我翻譯這部兵書，如能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盡了多少義務，那也算於願已足了。”⁽⁴⁶⁾ 鄧文儀在《李浴日與中國兵學》中高度評價他的翻譯、編纂和研究工作：“……李先生又編著《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及《兵學隨筆》二書，更具體的把中國兵學與世界兵學之聯繫研究及貫通闡揚，提供重要參考資料。這些重要著述，不僅對過去的中國兵學有重要貢獻，而且對於未來的中國兵學也有重要啟發。”⁽⁴⁷⁾ 事實正是如此。

不過，雖然李浴日在某方面自覺接受馬克思經典哲學家關於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的觀點，但是，隨著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喪失，李浴日到台灣後思想意識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後任國民黨金門防衛高參，且逝於任上，為蔣介石最放心、最信任的人選之一）。這一時期他對部分學理的闡釋和運用就帶有深刻的社會痕跡和階級烙印，這些都反映了李浴日的時代局限。

時間進入 21 世紀，和平和發展是世界的兩大主流。但是，戰爭的陰霾不散。這讓我想到了李浴日的話：“我老實告訴你，今後的世界是不會永遠和平的，你們還是空談和平，坐讓敵騎蹂躪，抑是腳踏實地接受戰鬥的學術起而自強自衛？”⁽⁴⁸⁾ 研究李浴日的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堅持世界眼光，與時俱進，不斷吸收世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把戰爭消滅於萌芽狀態，與世界各兄弟民族攜手前進，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這才符合李浴日研究克勞塞維茲軍事理論的根本目的。

2012 年 2 月

註釋：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33) (34) (35) (36) (46)
成田賴武著、李浴日譯《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1940 年 2 月成田賴武序、1943 年 11 月李浴日譯序、1945 年 10 月楊言昌序、1945 年 10 月楊言昌序、1955 年春徐培根序、1947 年 4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

1951年9月李浴日序、1951年9月李浴日序、1951年9月李浴日序、1951年9月李浴日序、第229—230頁、1951年9月李浴日序、第229頁、1943年11月李浴日序，1956年6月台灣版世界兵學社；

(6) (30) (31) (44) (48)李浴日《孫克兵學新論》第178頁、1943年6月編者序第3頁、1943年6月編者序第3頁、1943年6月編者序、1943年6月編者序，1947年1月世界兵學社；

(16) (18) (32) (37) (38) (39) (40) 李浴日《兵學隨筆》第1輯第2頁、第1輯第2頁、第1輯第4頁、第4輯第141頁、第4輯第141頁、第4輯第142頁、第4輯第142頁，1952年5月台灣版世界兵學社；

(17) (42) (43) 李浴日《孫子新研究》第4頁、第51頁、第51頁，1946年8月世界兵學社；

(20) 夏徵難《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研究》第95頁，1989年3月解放軍出版社；

(21) (23) (25) (26) (27) (28) (29) (41) 李浴日《中山戰爭論》第96頁、第98頁、第100—101頁、第25頁、第25頁、第24頁、第96—97頁、第25頁；

(24) 李浴日《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戰爭與政治》第48頁，1942年7月世界兵學社；

(45) 宋澤濱《〈戰爭論〉在中國：百年傳播及研究綜述》，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50期第9版；

(47) 鄧文儀《李浴日與中國兵學》，載1955年9月《戰鬥月刊》第三、第四期合刊。

參考書目：

- 1、李浴日《兵學隨筆》；
- 2、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 3、李浴日《中山戰爭論》；
- 4、李浴日《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 5、李浴日《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
- 6、李浴日《台灣必守鐵證》；
- 7、張伯亭《克勞塞維茲戰爭論之研究》，1957年1月台灣實踐出版社；
- 8、夏徵難《克勞塞維茲戰爭哲學思想研究》，1989年3月解放軍出版社；
- 9、吳瓊《論克勞塞維茲〈戰爭論〉》，2002年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2003年月廣東人民出版社。

作者介紹：

李龍，1966年10月出生於雷州半島一個普通農家。大學本科畢業。長期以來，致力於區域文化的研究、創作和收藏，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間主要學者之一。現為湛江師範學院雷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湛江海洋大學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員，雷州市第七、第八屆政協委員。電子郵箱：leizhoulilong@163.com